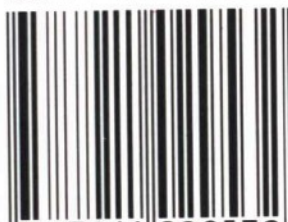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

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深入地研究国家经济安全监测预警问题的学术专著。

作者对我国 21 世纪面临的重大经济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定性与定量结合的角度，建立了我国经济安全监测理论体系、体制框架、数学模型；对粮食、能源、矿产、信息、外资引进等领域的安全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提供了监测预警方法和战略对策，具有很强的政策上的操作性；介绍了国外经济安全监测体制、方法和实例等。

ISBN 7-211-02953-6



9 787211 029532 >

ISBN 7-211-02953-6

F·177 定价:17.60 元

CHAO YUE WEI JI

超越危机

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预警

福建人民出版社



超越危机

CHAOYUE WEIJI

——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预警

赵英 主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76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福州塔头路2号 邮编:35001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0.5 印张 4 插页 247 千字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211-02953-6

F·177 定价:17.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序一

王洛林

目前，正值全球经济的多事之秋，由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蔓延，已经对全球经济产生全面影响。幸运的是，中国在这场危机中所受影响相比其他国家而言，不算很大。但我国的出口也受到了较大影响；股市受周边市场影响也出现了较大波动；香港金融市场则更是经受了狂风暴雨的考验。展望 21 世纪，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我们需要考虑和防范的经济风险会更多、更大。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

值此多事之秋，赵英等同志的专著《超越危机——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预警》问世了。我想，这对政府部门、学术界都是十分及时的。这本书虽然是一本理论专著，但其中研究和介绍了国内外各种预见、防范、化解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方法，可供政府部门操作时借鉴。其中有许多政策建议，我认为是可行的。

本书侧重于用定量的方法来监测预警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并

建立了初步的理论框架，把这方面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对促进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有很大好处。就定量研究方法来说，经济安全方面的监测预警理论，从出现到成熟，恐怕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本书所探讨的方法，由于资料所限，必然会有不周之处，但第一步毕竟迈出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令人高兴的。

本书作者关心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政策问题，观点鲜明，敢于大胆设想。这也是值得鼓励的。

本书作者思索的很多问题是 21 世纪的问题。希望他们能把这方面的研究继续深入下去，为我国在下一世纪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而努力奋斗。

是为序。

1998 年 9 月

序二

周叔莲

六年前，赵英、胥和平同志的专著《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国家经济安全论》出版时，我曾应邀为之作序。当时，这个问题刚在国内引起注意，关心的人还不多，我阅读了他们的书稿后认为：“现在重视和加强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和十分迫切的。”果然，90年代中期，尤其是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到来，经济安全已成为我国政府部门、经济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越来越多的人从切身经历中体会到了经济安全的重要。

今年，赵英等同志在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国家经济安全监测预警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超越危机——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预警》一书。这本书对当前经济安全方面人们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了回答，并从战略和政策等角度，提出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看法。我认为，他们紧密结合实践需要，针对现实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这种学风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发扬的。现在出版此书，是非常及时的。这本书从内容到方法，都较前一

本书前进了一大步。

首先，在内容方面，本书结合当前最新的情况，对外资进入给民族经济的影响，对信息安全给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研究。本书针对性强，采用资料新，在分析层面上也有更深的开掘。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侧重于定量分析，并对一系列政策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可操作的建议。本书作者力求使不懂数学而参加政策制订的官员，也可以看得懂。

再次，作者认真研究了外国维护经济安全的政策、方法和经验教训。例如，研究了日本如何维护粮食安全的做法；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如何维护能源安全的做法等等。对于外国经济安全管理体系等问题，本书也有详实的介绍与分析。这些都加强了本书的理论性和实用性。

此外，本书对如何做好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预警工作，提出了一个基本思路和框架，这对于当前实践和今后进一步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

本书不足之处是缺少金融方面的深入分析，但作者已看到了金融问题的重要性，并感到它太重要了，需要专题研究。希望作者在更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有更高水平的专著问世。

1998年9月

CHAO YUE WEI JI



目录

(1)	1. 导言
(1)	1.1 量化的国家安全战略
(8)	1.2 目标与体系
(12)	1.3 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17)	2. 21 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安全总体判断
(17)	2.1 判断的基本前提
(19)	2.2 总体评价
(32)	2.3 维护中国 21 世纪经济安全必须重视的几个战略问题
(36)	3. 国家经济安全监测预警体系与危机管理体系
(36)	3.1 利益协调与手段选择
(39)	3.2 我国经济信息体系与经济管理体系的现状
(41)	3.3 我国经济安全监测预警体系的构想
(44)	3.4 我国经济安全危机管理体系的构想
(49)	4. 国家经济安全监测预警方法与模型
(49)	4.1 国家经济安全定量研究可选择的基本方法
(63)	4.2 国家经济安全模型设计与结果
(90)	5. 国家经济安全监测预警系统
(91)	5.1 指标体系和预警界限

(106)	5.2	指标值到分数值的映射
(109)	5.3	数据处理
(110)	5.4	对 2010 年我国经济安全状况的预测分析
(116)	6.	能源与国家经济安全
(116)	6.1	能源安全及其判断标准
(122)	6.2	中国能源供需状况与分析
(142)	6.3	中国能源供需预测
(149)	6.4	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政策建议
(157)	7.	粮食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
(157)	7.1	准确判断当前我国粮食供需状况
(161)	7.2	科学预测 2010 年我国粮食供需状况
(166)	7.3	我国粮食贸易现状、特点及国际环境
(171)	7.4	监测粮食经济安全的指标及保障粮食经济安全的政策建议
(174)	8.	矿产资源与国家经济安全
(174)	8.1	矿产资源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的总体评价
(177)	8.2	矿产资源供需状况及 21 世纪初矿产资源需求形势预测
(193)	8.3	世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 21 世纪初矿产资源供需形势
(205)	8.4	保障矿产资源供应经济安全的政策建议和措施
(213)	9.	外资进入与国家经济安全
(213)	9.1	引进间接投资与国家经济安全
(214)	9.2	引进直接投资与国家经济安全
(219)	9.3	国外有关情况分析——以美国为例
(223)	9.4	监控国家经济安全的指标设计——从外商直接投资角度

(225)	9.5 提高国家经济安全的对策建议——从外商直接投资角度
(229)	10. 信息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
(229)	10.1 信息安全与信息战
(232)	10.2 信息安全问题对中国经济安全的挑战
(236)	10.3 信息系统的安全监测与预警
(237)	10.4 维护 21 世纪中国信息安全的有关对策
(240)	11. 国外经济安全管理体制与政策
(240)	11.1 国外经济安全管理体制
(254)	11.2 西方发达国家能源安全政策
(263)	11.3 日本的粮食安全保障
(271)	11.4 世界各国直接利用外资的宏观调控措施
(281)	附录 1 世界石油工业发展概况
(302)	附录 2 海湾危机时石油储备对原油价格影响的分析
(309)	附录 3 日本石油储备经济效果的计量分析
(322)	主要参考文献
(325)	后记



1. 导言

1.1 量化的国家安全战略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不计其数的冲突、对抗与战争。这些冲突、对抗与战争，既是对立的、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争夺，也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形式和转化形式；既是人类文明的结果，也是推动人类文明的动因；既是人类某种制度安排的结果，也是推动制度变革的力量；既是人类理性的结果，也是人类受到非理性操纵的明证。从整个人类发展进程的历史看，这些冲突、对抗与战争，从整体上加大了人类追求全球福利最大化的成本，使人类为此付出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正因为如此，后来的历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在评论历史上某些冲突、对抗与战争时，常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如果不那么做，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这类“如果不……，可能会……”式的结论，对当时的历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有意义的是对后来者的规劝与启示：如何避免冲突、对抗与战争；如何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对抗与战争中获得对双方来说均为最佳的结果，减少人类为取得历史性进步而付出的代价。

现代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的发展，为我们分析国际政治

中的冲突、对抗与战争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笔者想用这些方法来分析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在国家与国家的冲突、对抗与战争中，总是不能获得对双方来说均为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结果。换句话说，为什么在国家与国家的冲突、对抗与战争中，双方总是不得不接受一个对自己来说相对成本过大、收益较小的结局。

抽象地分析，任何国家的利益及其在冲突、对抗与战争中的成本、收益，都是可以在一定的理论框架内量化的，而且可以进行较为精确的评估。这种较为精确的评估，应当可以使双方在冲突、对抗与战争的过程中的某一均衡点上达成妥协，使双方都看到再继续对抗下去，就会失去解决问题的最佳机会，使成本上升，失去使利益最大化的机会。如果我们把对抗的国家比喻成两台进行棋类比赛的计算机，那么这种最佳的妥协点是会找到的。但在现实中并非如此，这是因为：

第一，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关系、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政治资源的不同程度的掌握，会打乱“科学”的战略分析的逻辑，使“国家”无法以抽象的、最优化的战略思维，制定出最优化的国家安全战略。

第二，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个人偏好所进行的“公共选择”，也使抽象的、理论上存在的最优化战略决策无法作出。

第三，任何机构、决策者，在作出决策时都处于信息不完备的状态，这里仅仅指的是对自己一方信息不完备，尚不包括对敌方的信息严重短缺。在这种状态下，同样无法作出最优化的战略决策。

第四，作出决策需要付出巨大的信息收集成本，即时间。任何机构、决策者在决策时总是遵循“简单化”原则，在处理危机时尤其如此，需要决策者根据已往的经验和已有的方案，凭直觉

去进行选择。从这一点看，最优化决策也无法作出。

第五，任何重大战略决策的作出，总是一个相互妥协、折衷的政治过程。不同利益、偏好的冲突、对抗和调和，使理论上存在的整体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在战略上难以表达，在操作层面上难以实施，不能得出战略最优解。各种国家安全力量之间（如军队、外交、安全机构）也存在着各自的利益与部门偏好，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博弈行为。这种部门利益、偏好和博弈行为，往往导致信息的扭曲、封锁和战略的偏差。因此，所谓“国家利益”，往往只能是一组勉强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战略中的“利益束”。所谓“利益束”是指国家综合各方面的利益与要求，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这里首先不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哪个阶层、集团的利益在战略中得到了更大的、更为充分的表达。

第六，有些国家利益本身是难以确切量化的，如沙皇俄国十分便宜地卖掉了阿拉斯加。除去沙皇缺乏远见不说，谁能够准确地估算其价值，尤其是对其长远的利益预期作出准确估价。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是根据当前的现实作出决定的。

有些国家，从体制上和治国方法、技术上看，就不是如黄仁宇先生所称的“具有可数的历史”的国家。“不仅是中国的作家，连很多西方学者，直到最近才能彻底体会到，商业大规模展开，所依赖的不是货币而是信用，很多大宗商业之进出，不一定要货币亲自登场。而最初信用之能遂行，有赖于以农起家的资本家和商人间的鸿沟逐渐消失，社会之间产生一种‘架构上通贯的力量’（structural coherence）。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中之内在物质都能公平合理的交换，于是可以开始数目字上管理。”^①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体制下，处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阶段，因

①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上海：三联书店，1997.83~84

此，从对利益的看法上，从实际利益的构成上，从利益交换的技术层面上，国家间的利益无法进行通约、交换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换句话说，要想把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换算成源于西方国家的商业利益，并采用成本——利润的“可数”观念予以核算是极为困难的。顺便讲一句，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中出现了所谓“经济学的霸权”，亦即经济学中的学术思路和方法论“无限”地向社会科学其他领域扩展和转移。笔者也受此影响。但经济学有没有一个拓展的“边界”呢？笔者认为，在本节中所探讨的问题，就属于经济学的“边界”之一，如面对人类不同阶层、集团的利益的协调与无序化；不同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价值观的阻碍；国家、阶层、集团间利益博弈的“艺术”黑洞；制度的特定问题，经济学的科学、理性的量化逻辑思维是软弱无力的。

除去国家间的利益难以通约外，任何国家内部的利益都是多元的，包括安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利益。这些利益组成一个“国家利益束”，形成整体的国家利益。对不同的国家来说，根据自身生存、发展之需要；对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评价，有不同的国家利益目标排序。也就是说，安全、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国家利益，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分量。这种情况，也使国家间的交易难以达成，使参加交易的每一方在理解对方意图方面，易于产生困惑。

此外，有些可以量化的国家利益由于量化成本过高，尤其是时间成本过高，也无法确切量化，导致国家在处理有关问题时，把无法量化的问题和可以量化的问题摆在一起，无法准确估量。国家利益排序不同，导致国家间在冲突、对抗与战争中，难以进行像市场交易那样的利益交易。在市场交易中，一切都抽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观和效用，在国际冲突中则因不同的价值观和效用观而无法交易。

如果说上面讲的问题带有某种“技术上”的意义，那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价值观的整体性使国际冲突中的战略量化难以进行。任何民族、国家的价值观，都是一个围绕着某一核心价值体系而形成的整体。这一价值观，使民族、国家在处理具体民族、国家利益时，不能不深受其束缚。量化的战略分析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以国家能进行理性战略思维，能把整体战略利益进行局部分析，从而决定战略、策略为前提的。而恰恰相反，多数冲突、对抗与战争的历史，是起源于非理性的战略思维。过分执著于某种价值观，反而会看不到国家利益的真正所在，因价值观的局限，无法作出局部的让步，以达成妥协。因此，从战略角度对国家价值观进行认真贯彻，往往导致国家利益的损失。这是十分深刻的哲学问题。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我们的国际政治棋局无法得出对双方都是最好的结果，那么我们所作的两台计算机进行棋赛的比喻，是否就全无意义了呢？不是。正如经济学中的完全均衡、充分竞争的市场一样，这种理论抽象自有其意义。

首先，它表明人类的理性和行为需要向一个更为理想的目标发展。其次，它作为一种“标准”对人类目前的行为起着纠正作用，提出了改进的目标，并可以对政策制定起到启示作用。再次，它提示出人类要达到在冲突、对抗与战争中双方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的充分条件，并使人类认识到这些条件的重要。下面我们这一计算机棋局，对国际政治及战略制订进行分析。

两台计算机的棋局比赛表明，充分的信息和强大迅速的信息搜索能力，对双方寻找最佳结局是十分必要的。这表明，在战略制定中及时提供信息的重要性。在国家与国家的冲突、对抗与战争中，不可能得到全部必需的信息，也付不起长时间搜索信息和分析各类方案的成本。因此，只能依据有限信息，采取尽可能满意的结局。尽管如此，“满意的结局”的前提，也是以必要的信息

为前提的。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进一步思索：在冲突、对抗与战争中，尽可能地隐蔽己方的信息是否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未必，因为一味地隐蔽信息，可能使对手作出过度的反应，从而延误妥协的达成，或使己方的损失加大。在冲突、对抗与战争中双方均掌握必要的信息，是寻找均衡点的前提。

但是在实际冲突、对抗与战争中，双方均想在博弈中尽量得到更大的利益，因而很难主动地透露信息。此时，有一个客观中立的信息网向双方及时发布信息，就是十分重要的。

在现实国际舞台上，联合国、中立的调解者都可以起到向双方发布信息，指出双方达成合作、和解的利益所在。

现代信息手段——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为双方平时相互了解、沟通信息创造了技术条件，同时也使双方的掌权者对本国人民隐瞒某些信息更为困难。可以说，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已具备了使双方充分了解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高速公路是帮助人类解决对抗的理性工具。它增加了开放信息，提高了对抗双方的透明度。

由于现代冲突、对抗与战争具有很大的“外部性”^①，如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放火燃烧油井，使全球的空气受到污染，因而及时地向敌对双方提供信息，对增进全球福利是十分重要的。

对抗双方寻找利益的最佳均衡点，也是一个十分有用的概念。理论上利益最佳均衡点的存在，可以使我们对国家与国家的对抗有新的认识。在对抗过程中，一味追求传统的“胜利”是不必要

^① 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性是指：一个人或一家厂商、一个国家实施某种直接的、影响他人的行为，而对此不用赔偿。这时外部性就产生了。这些个人、厂商或国家对其行为的全部后果不负任何责任（行为的影响对个人、厂商或国家来说是外部的）。外部性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负的外部性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工厂的空气污染。工厂从排放污染中获利，却不必为污染造成的后果付出成本，受到惩罚。外部性是普遍存在的，可认为是市场机制缺乏效率的表现之一。